

《海上花列传》

今译与翻译研究

陈吉荣——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海上花列传》

今译与翻译研究

陈吉荣——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花列传》今译与翻译研究 / 陈吉荣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308-11302-1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海上花列传》—翻译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243 号

《海上花列传》今译与翻译研究

陈吉荣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6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302-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 言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邦庆所作的章回体小说,是方言文学(吴语文学)的杰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张爱玲对该小说作了两次翻译。一是语内翻译,就是将《海上花列传》从方言作品翻译成国语作品。二是语际翻译,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国语译本《海上花列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得到研究者好评,英文译本《海上花列传》则是在 2000 年以后引起研究者重视。

鉴于目前《海上花列传》翻译视角的研究不足,特别是其语内翻译(今译)与语际翻译的对比研究阙如,本书主要关注《海上花列传》的今译与翻译研究。具体研究思路分三步走:

第一步,《海上花列传》翻译研究综述,主要从《海上花列传》的综述研究出发,描述《海上花列传》的翻译研究现状,提出本书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第二步,翻译形态研究。分别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角度研究《海上花列传》的翻译策略、翻译问题和翻译过程。

第三步,翻译比较研究。分别比较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共性与差异,指出其五个方面的翻译差异和四个方面的翻译共性。

最后是对全书的研究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总结。

就理论建构而言,本书主要研究古籍今译的理论形态。与以往的做法不同,本书的研究是集中了分期研究与分类研究两个角度。基于清代小说

《海上花列传》的中文今译和英文外译两个层面,本书涉及古籍今译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认知问题和形态比较问题。

从语言问题的角度来看,本书对方言翻译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典型个案,并且在方言体系和标准语体系之间架设翻译研究的新桥梁,为解决方言今译过程中音义两难的理论问题提供了解释性途径。

从文化问题的角度来看,本书对古籍今译过程中的文化问题作了后续研究,即着眼于文化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通和转变。既研究文化的历时性传承也研究文化的共时性传承,还研究文化的转换性传承,从而为古籍今译提供三层理论研究视角,也使得古籍今译的文化问题有了立体的研究框架。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本书研究了古籍今译过程中的认知参照点、默认值与体验性等多个认知层面。通过人类有限的认知方式来解释古籍今译过程中形成文学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基于考证基础上的认知研究可为古籍今译提供内位的研究框架。

从形态比较问题的角度来看,本书研究了古籍今译过程中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形态,即从吴语译成国语,从中文译成英文。在这两个形态中,其共性有五个层面,差异有四个层面,分析这些不同的层面可以进一步揭示古籍今译的理论形态,为古籍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2)
一、为方言翻译提供理论线索	(2)
二、为古籍今译提供新的文体类型	(4)
三、建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桥梁	(5)
四、为认知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6)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6)
一、研究思路	(7)
二、创新点	(7)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8)
一、研究内容	(8)
二、研究方法	(8)
三、重点和难点	(9)
第二章 翻译世界中的《海上花》	(10)
第一节 《海上花》研究综述	(10)
第二节 《海上花》翻译研究现状	(12)
第三节 译者张爱玲研究	(13)
一、研究现状	(14)
二、问题与原因	(14)

三、潜力与制约	(16)
四、《海上花》翻译研究的特殊意义	(17)
第三章 语内翻译中的《海上花》	(19)
第一节 典籍翻译理论概述	(19)
一、国外典籍翻译研究特点	(19)
二、国内典籍翻译研究特点	(20)
第二节 语内翻译的方言问题	(22)
一、《海上花》的语言格局	(22)
二、吴语的翻译困难	(26)
第三节 语内翻译中的译者阐释	(32)
一、语内翻译及译者的阐释	(33)
二、同一性与差异性	(34)
第四节 对白翻译的语内策略	(40)
一、副词的灵活转换	(40)
二、形容词的模糊对等	(44)
三、名词的详细注释	(46)
四、其他词类的转换	(47)
第五节 方言翻译再认识	(49)
一、方言翻译的边缘化地位	(49)
二、方言翻译被冷落的原因	(50)
三、方言翻译研究的思路	(54)
第四章 《海上花》的语际翻译	(57)
第一节 物质文化特色词翻译	(57)
一、物质文化特色词的种类及功能	(58)
二、物质文化特色词的翻译	(61)
第二节 《海上花》英译的总体特色	(66)
第三节 《海上花》总体翻译策略	(79)
一、文化因素可分性介入	(79)
二、文学形象的认知转换	(82)

第四节 译者翻译策略之转型	(85)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85)
二、异化的翻译策略	(89)
三、翻译策略转型的原因	(92)
第五节 女性主义翻译诗学	(94)
第五章 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	(100)
第一节 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之差异表现	(101)
一、默认值差异	(101)
二、认知参照点不同	(107)
三、隐喻方式不同	(112)
四、文化脚本差异	(125)
五、本地化差异	(127)
第二节 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之共性特征	(129)
一、体验共性	(129)
二、翻译共性	(140)
三、文化资本运作共性	(148)
四、翻译社会化趋向共性	(152)
第三节 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关系之再认识	(155)
一、语内翻译研究现状	(156)
二、语内翻译的再认识	(158)
三、语内与语际翻译的传承与超越	(159)
四、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互文性	(162)
第六章 结 语	(165)
第一节 实证性研究结论	(166)
第二节 理论性探讨	(168)
参考文献	(171)
索引	(194)
附录 1	(198)
附录 2	(206)
后记	(210)

第一章 绪 论

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上花》)是中国文学史上方言文学的杰作。这部小说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放映发行。如果把电影改编也看成一种广义的影像与文字之间的翻译形式的话,《海上花》可以说是跨度时间长、翻译形式多样的一部方言古籍文学作品。该小说由中国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翻译,在翻译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的研究旨在为翻译史上典型的翻译个案作带有比较性质的实证研究,以期对翻译活动中一种特殊的个案进行深度分析,从而解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了各自的功能。本章将详细介绍本书的研究动机、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海上花》是清朝末年韩邦庆用方言写成的吴语作品的杰作。小说文体风格清新自然,没有青楼小说的艳异之气,反而处处彰显“平淡近自然”的生活况味。不论是在叙事风格还是人物描写上都有一定的突破。不过,由于小说人物对白中大量使用吴语,加上小说中体现的文学现代性特点,

该小说的读者群无法与《红楼梦》相比,而学者们对《海上花》的研究特别是对《海上花》的翻译研究也终究有限。目前关于《海上花》的翻译研究状态有以下几种:一是作为张爱玲翻译研究的一个部分来做个案研究;二是作为语内翻译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个案加以研究;三是作为张爱玲创作影响的一个部分加以研究。从《海上花》整个翻译过程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尚不多见。

就《海上花》的翻译过程来看,该书翻译历时时间长,翻译形态多样。《海上花》最初发表于光绪壬辰(1892年)二月创刊的刊物《海上奇书》上。全书人物语言全部使用吴语。大约89年后,1981年,张爱玲用国语译注的《海上花》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实现了《海上花》从吴语转向普通话的翻译。1982年,张爱玲又将《海上花》第一章和第二章翻译成英文,发表在香港的《译丛》杂志上。2005年,张爱玲英译的《海上花》全部手稿经过孔慧怡博士等人的修订,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海上花》从原作作品发表到翻译作品出版历时大约113年,经历了同一个译者的两次翻译,一次是语内翻译,一次是语际翻译,这在翻译理论史和翻译实践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其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方法都很有新意。本书的写作动机旨在努力从翻译过程的角度,结合《海上花》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关键环节,以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作为深层的理论基础,以文化资本运作等为研究视角,为古籍今译研究和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第二节 研究意义

《海上花》今译与翻译研究之意义主要涉及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应用价值。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该研究丰富了方言翻译与古籍今译的实践,同时也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该研究为两种不同的翻译形态做出了新的解释,也为认知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

一、为方言翻译提供理论线索

方言翻译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难点问题。关于非标准语与标准语之间

的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历史性也关涉语言的地域性。西方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曾认为,原文是一个历史节奏,译文是一个历史节奏。这种历史性差异在语内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海上花》的语内翻译中,1892年的原作描述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他们以其自身熟悉的方言构建了一个充满吴依软语的人文世界,形成了一个清朝末年商娼世界的历史节奏,而1981年的国语译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叙事语言,只将人物对白中的方言转换成国语,使得译文从南方世界缓慢幽深的历史节奏转变为俊朗明晰的北方节奏。这种历史节奏上的跳跃不可避免地也带来地域性特征的改变。不过,由于语言节奏深层的生命体验和生活体验具有同心性质,使得方言在穿越历史节奏时在形式化方面没有太大的困难,反而是附丽于方言背后的精神体验更值得译者重视。正如蔡新乐所言:“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自我与非我的历史性或时间性,而是它们的地域性:对空间的占有总是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从最终结果来看要归入历史,因而带有本质上的历史性。但它毕竟是地平域延展中的认识,毕竟是世界形成一个‘形式’或‘框架’,由‘精神’‘随意’自由地运动。任何历史的羁绊最后都由对过去的文本的‘误解’而解开:历史只是地平域中的历史,因此释古即是释今。只有在这个在场的现在现时,地平域才产生文化世界的空间性,从而使自我有栖身之地和对自身的‘设定’之力。假若历史性一定要自我回归历史,那必然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精神囚禁’:精神不是要扩展它所超越的世界,而是遁入另一个维度,背离在场的现在现时,因而无暇顾及自我生存的当下构筑及其存在形式。”(2000:58)。

本此,方言翻译的实质是人的精神对其自我的一种转化。这一过程既要包容人的历史性也要包容语言的地域性。《海上花》的方言在翻译成国语时,译者不仅要考虑人物对白、人物情感和人物身份(这些与人的精神自我紧密相连的部分),也要考虑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对生命与生活的体验。与此同时,《海上花》翻译研究为方言翻译提供了如下几个理论视角:方言中典型的语词翻译功能如何实现?方言经过转化之后还能准确体现地域性特征吗?方言翻译过程中如何解决音位层和语义层之间的矛盾?跟方言语境有关的行院人物场所用语如何界定?跟方言语境有关的行院娱乐用语如何阐释?换言之,《海上花》的方言翻译研究不仅为个性化的人物对白翻译提供了研究视角,还进一步深入到方言翻译的语境研究和语用研究。

二、为古籍今译提供新的文体类型

古籍今译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倪永明曾提出建立“古籍注译学”的构想,并将其定位成古籍整理学的一门下位学科,“它的支撑学科有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翻译学、解释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甚至有关读者阅读习惯调查等新闻出版学的相关内容都应该进入它的研究视野。当然其核心内容是对古籍翻译成现代语体文时有关注译对象、注译规律以及语内翻译的原则、方法的研究”(2006:203)。郭在贻也提出训诂和注释对古文今译的重要性:“注释古书,必须通训诂,其理至显,无待烦言。此正如宋人郑樵所云:‘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谓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通志·艺文略》)按:古人之言有不通于今者,即需要运用训诂学的知识和方法加以诠释……而要正确、准确地翻译古文,必须通训诂。换言之,如果缺乏训诂的修养或根本无视训诂的基本法则,则其译文必不会准确,或者凭臆妄说,不知所云。”(2005:29—34)陈蒲清认为:“翻译与注释、简评结合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注释是不能代替翻译的,因为翻译可以把原文的意思整句、整段、整篇连贯起来,用现代汉语完整流畅地表达出来,再详细的注解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翻译也不能代替注释,翻译还常常要注释的辅助,如特别的概念、术语、句式、修辞等都要借助于注解才能弄清楚。简评则可帮助读者掌握原文的基本精神和特色。”(1999:29)黄永年也认为:“给古籍作注释,不论哪种体式,都是为了方便别人的,尽管有些注里要加进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普及性注本、选注本是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自更不待言。问题是有些注本、选注本虽用白话文作了浅显易懂的注释,总不可能每字每句都注到;即便每字每句都注到了,但全篇的意思对水平不够的读者来说仍不容易读通。这就需要进一步用白话文把全篇、全书翻译过来,这样读者就可把白话的译文和文言的原文对照起来读,或者先看白话译文再读文言原文,从而把原文读懂读通,对其中的养分有选择地吸取。这就是古籍今译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古籍的今译往往和注释同时并存。一般的形式是先作浅显易懂的注释,再附加今译。当然,也有的是在有了较好的高水平注本后,再写一本浅易的今译。”(2001:139)

《海上花》的今译与翻译既包含翻译过程也包含注释过程,在其从吴语

译成国语的过程中,译者张爱玲一共做了160条注释,在其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译者张爱玲一共做了95条注释。这些注释涉及与当时生活相关的人物、场景、事物、风俗等多个层面。译者的注译既有注释也有简评,还有积极的预测和推断。译者所做的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使得《海上花》成为古籍今译的一个非常好的个案。同时,由于目前古籍今译多关注文艺理论类版本,各类经、史、子、集的古籍今译本大量涌现,例如,《古文观止》、《四书白话句解》、《国语注解诗经》等的译注本,相比之下,小说类作品古籍今译的数量比较有限,对其所作的研究也相应较少。事实上,《海上花》的翻译研究可以为古籍今译提供新的文本类型,并为古籍今译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新的理论线索。

三、建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桥梁

语言学家雅克布森将翻译分成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类型(参见申雨平,2002:99—105)。这样的划分其实是较为精细地描述了翻译过程中几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张力。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系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这两种语言的文化根基相同,语言用法相似,一般体现出语言的历时性特点。语际翻译是指在不同语系中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这些语言之间的文化根基不同,语言用法差异很大,但是在语言结构的深层和认知世界的深层存有共性,更多体现出语言的共时性特点。符际翻译是指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翻译活动,理论形态上接近维特根斯坦所提到的“激进翻译”,例如有声语言和肢体语言之间的翻译就可看作一种“激进翻译”。在这三种翻译活动中,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分别都得到过研究者的关注。大体来看,语际翻译研究占主导地位,语内翻译研究次之,符际翻译研究最少。从语际翻译来看,不同语种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过两套56本西方翻译研究原著,都是语际翻译研究,各类理论研究和文本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论文集也是以语际翻译研究为主。从语内翻译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数量上远不能与语际翻译相比,但也体现出一定特色。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已经涉及非标准语与标准语之间的翻译研究,如黑人英语与标准英语之间的翻译,爱尔兰语与通用英语之间的翻译研究等。另外,南非和西班牙研究者也有关注当地古老的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翻译研

究。在我国的语内翻译研究中,古籍今译占了很大的比重。经、史、子、集的注释和翻译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也在文学作品中开始涉猎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翻译。不过,目前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作为一个连续翻译过程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译者是同一个人,而且历时时间久、翻译形态多样,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个案。深入研究《海上花》的翻译过程和翻译形态,有望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之间的理论连接架设桥梁。

四、为认知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认知翻译研究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关注。运用人类有限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现象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新方向,这种研究旨在揭示翻译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例如,翻译过程中的原型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识解型式分类,翻译过程中术语能力的形成,翻译过程中的共性研究等等。西方研究者还通过翻译过程中的大脑风暴、有声思维和眼动水平以及修改痕迹等实证性研究来具体分析翻译过程中不同水平的认知活动。

《海上花》的翻译研究涉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主要环节,由于这两个环节紧紧围绕一个译者,所以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翻译形式为翻译的认知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例如,两种翻译形式呈现出同心圆的性质:译者先做了语内翻译,然后在语内翻译的基础上做了语际翻译。在认知参照点上,这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并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同时,在这两种翻译形态里面,译者的翻译默认值不同,翻译识解型式也有差异,还体现出认知隐喻方式等的不同。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将进一步丰富和扩大认知翻译理论研究。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海上花》翻译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平行研究与比较研究相互穿插,分步骤、分层次展开,遵循“总一分一总”的研究模式,在研究的创新点上体现出多模态、多角度、深层结构的理论探讨之特点。

一、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海上花》翻译研究为契机,通过文本研究、译者研究、认知研究三个主要视角,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种形态,描述一本多译的不同过程,分析其中蕴含的翻译理论形态和认知手段与机制,从而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框架。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分成五步走:

第一步,《海上花》翻译研究的背景综述。具体包括《海上花》的文学背景、史学背景、翻译背景,还涉及译者张爱玲的翻译活动研究。这些背景研究是分析《海上花》翻译形态的基础,可以解释诸如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步,《海上花》语内翻译研究。具体包括《海上花》的方言翻译讨论,关键术语的古义今释,文化特色词的译注,译者主体性在语内翻译过程中的阐释。这些研究将为分析语内翻译的认知特点提供理论基础,也为进一步研究语际翻译作了准备。

第三步,《海上花》的语际翻译研究。具体包括《海上花》的英译特点研究,文化特色词英译研究,译者策略转型研究与译者主体性研究等。这些研究与第二步的研究形成对照,有利于进行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对比理论探索,为第四步的研究提供比较的基础。

第四步,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理论联系研究。这一部分既包括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差异研究,也包括两者之间的共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方言翻译的理论问题和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关系问题。

第五步,在上述四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对最突出的理论研究问题作进一步的总结,归纳目前研究的成绩与局限,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针对一个译者两种翻译形态的研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都属于典型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贯通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之关系,关注其共性与差异研究,实现

了多模态、多角度、深层结构的理论探讨,为阐述两种不同形态的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3. 明确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分别是“为了同化目的的翻译”和“为了多样化目的的翻译”,从翻译功能的角度阐释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4. 进一步明确了语言的音义两极性,解释了方言翻译的特殊性,并且突显了方言消解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之界限的原因。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书立足于古籍今译与翻译研究,既注重文本分析也注重理论建构。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本书主要研究内容涉及《海上花》吴语本、国语本、英语本三个文本的研究,包括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语言特点、文体特色、注释与阐释等,也涉及三种文本之间的互文与比较。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本书主要涉及古籍今译、语内翻译中的译者阐释、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等几个主要方面,特别关注到认知语言学在分析两种翻译形态过程中的作用。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宏观层面的关于典籍翻译理论的探讨;二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层面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对比研究;三是实证层面的《海上花》翻译个案研究。结合本书的研究内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与难点也体现出一定的特点。

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理论描述法,对比分析法,文本阐释法。在理论描述部分主要涉及如下领域:方言翻译的理论途径,古籍今译的理论探讨,语内翻译的策略特点与文化张力,语际翻译的策略特点与文化张力,翻译过程中的认知体验等。对比分析法主要涉及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对比分析,方言与标准语的对比分析等方面。文本阐释法主要包括语内翻译中的文本阐释,语际翻译中的文本阐释。具体涉及原文本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译文本的翻译策

略、价值取向、功能目的等。除了原文与译文的正文研究之外,文本前后的序言和跋、注释、附录与评论都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重点和难点

本书的研究重点分成理论重点和实证重点两个部分。在理论重点部分主要涉及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之间深度的理论形态分析,其共性和差异所表现的理论层面及其成因,如何解决方言翻译的特殊性问题,如何在两种形态之内的译者的主体性,如何理解两种形态中文化资本的运作方式,方言是如何消解了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差异的,如何理解认知语言学提出的音义两极性。实证重点主要是要研究典籍翻译的基础理论形态,古籍今译的基本做法,语内翻译的语言表现,特别是方言的特殊性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解决的,语际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因素和注释,以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实例比较等。

本书的研究难点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差异研究。由于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缺少现成的已经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加以借鉴,可以借助认知语言学理论打开研究思路,即从默认值、参照点、隐喻方式、文化脚本和本地化等多个层面进行区分。本书的研究难点也涉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共性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与互文研究,这部分内容也需要有延展性的、开阔的理论视野,同时也要有具体的分类研究。